

恩维尔·霍查的 阿尔巴尼亚

〔南〕米伦科·巴比奇等著
达洲 李代军译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恩维尔·霍查的 阿尔巴尼亚

中国首部全面介绍阿尔巴尼亚的专著

（匈） 李永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恩维尔·霍查的 阿尔巴尼亚

〔南〕米伦科·巴比奇等著

达洲 李代军译

人民出版社

Milenko Babić i drugi

Enver Hodžina

ALBANIJA

Novinska Agencija Tanjug

Beograd, 1981.

根据贝尔格莱德南通社1981年版译出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恩维尔·霍查的阿尔巴尼亚

Enver Huchë de Aërbaniya

〔南〕米伦科·巴比奇等著

达洲 李代军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印张 215,000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550

书号 3001·1930 定价 1.10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南斯拉夫国家通讯社南通社组织米伦科·巴比奇、莫姆契洛·布拉戈耶弗奇、斯特万·乔尔达什、米奥德拉格·久基奇、博里斯拉夫·拉利奇、阿莱克桑达尔·马尔科维奇、留宾卡·米洛瓦诺维奇、德拉戈米尔·帕夫洛维奇、韦利扎尔·萨维奇、斯拉夫科·斯塔尼奇、米哈伊洛·沙拉诺维奇、拉迪沃耶·武克切维奇等十二名记者、编辑撰写了《恩维尔·霍查的阿尔巴尼亚》一书，于1981年7月出版，第一版六万册一销而空。

这本书之所以在南斯拉夫受欢迎，主要是作者用事实和资料，特别是阿方自己的史料说话，比较客观地介绍了阿尔巴尼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情况、阿南关系的曲折变化、阿尔巴尼亚现政权的内外政策以及恩维尔·霍查其人，从中可以看出霍查是如何走上一条反人民的、个人独裁的反动道路的。

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被称为“欧洲孤岛”、“巴尔干的幽谷”的阿尔巴尼亚及其领导人恩维尔·霍查种种行径会有所裨益。至于霍查对我国领导人和内外政策的攻击诬蔑，相信读者自可明辨是非，加以批判，故仍予保留。中译本主要供党政领导干部和有关研究者参考。

由于本书是集体撰写的，个别章节和段落的内容有重复，在翻译过程中作了删节。

由于水平有限，疏漏差错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指正。

1982年9月

2016/06/20

目 录

毫无回音 (代序)	1
第 一 章 阿尔巴尼亚的“围困综合症”	5
第 二 章 崇山峻岭中的国家	17
第 三 章 战争和革命的年月	28
第 四 章 卢森堡宫的故事	50
第 五 章 两个邻国，两个友邦	60
第 六 章 站在斯大林一边	85
第 七 章 同莫斯科决裂	94
第 八 章 “中国插曲”	105
第 九 章 反对一切	114
第 十 章 友谊一夜之间被忘却	129
第十一章 地拉那的暴君	142
第十二章 幸存者的控诉	161
第十三章 光凭法令统治	177
第十四章 遥远的地拉那	194
第十五章 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情况	198
第十六章 对科索沃的看法	208
第十七章 “大阿尔巴尼亚”	226

第十八章	恩维尔·霍查眼里的世界	
	和其他的语录.....	233
第十九章	世界报界的反映.....	263
文件选录.....		270
参考书目.....		283

毫 无 回 音(代 序)

近二、三十年来,南通社曾多次向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提出请求,希望在地拉那开设常驻分社,或者至少允许它不定期地向阿尔巴尼亚派出特派记者。

南通社还曾两度通过官方途径向阿尔巴尼亚当局提出这样的要求,强调指出在这方面建立合作可以使两国增进了解、加强合作并促进睦邻友好关系。

然而,毫无回音。地拉那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说一声,它对我们的记者不感兴趣,它的边界不向我们的记者开放。

应当说,在这件事情上,南通社并不是例外。阿尔巴尼亚的大门对于南斯拉夫其他各家报刊的编辑部也是紧闭着的,尽管它们也曾一再试图向地拉那派出自己的记者。在这件事情上,甚至在两国关系稍有改善的不常有的时期,阿尔巴尼亚政府也不改变态度。

然而,在这样的时期,有记者设法去过阿尔巴尼亚几天时间,但是,照例这是“半合法地”去的。也就是说,记者是随同个别艺术团体、体育代表队和不多见的旅游者团体前往作这样的不常有的旅行的。他们在回国以后,不时地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一些观感,这些观感尽管为数不多,却使人们对于当代阿尔巴尼亚的生活有较多的了解。

可见,关于阿尔巴尼亚,我们这里很少有人写过些什么,所写的基本上是以阿尔巴尼亚通讯社对外播发的材料为依据的,或者

是根据地拉那电台的广播。

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写一部关于阿尔巴尼亚的书，决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各家报刊、通讯社的编辑部里没有研究这个国家的“专家”，之所以没有，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些编辑部里没有以前驻过阿尔巴尼亚的记者，而另一方面则因为令人遗憾的是实际上没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国家。

近二十年来，除了几本小册子之外，我们这里关于阿尔巴尼亚几乎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也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不论是在政论作品的范围内，还是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这就使写一部关于阿尔巴尼亚的书所遇到的困难变得更大了。

最后，关于阿尔巴尼亚，在世界上写的东西也不多。只有在恩维尔·霍查的政权“大转变”的时候，即先是中断了同南斯拉夫的，接着是同莫斯科、北京和别的国家的友好关系的时候，全世界才想起了这个国家，才觉得有必要了解这个国家，并就这个国家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全世界的报刊不得不满足于地拉那发出的不多的消息。应当考虑到，今天在阿尔巴尼亚不存在任何一个外国通讯社的分社，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记者。过去十年来中，最后的和唯一的一个通讯社分社是北京的新华社分社。

这一切势必使写作这本书变得困难。这本书不抱其他任何奢望，用记者的话来说，只想让读者了解当代的阿尔巴尼亚、恩维尔·霍查的政权、恩维尔·霍查其人，只想谈一谈为什么这个国家成了“孤家寡人”，为什么它几乎同所有的国家都闹翻了，它的人民生活得怎样，它是怎样诞生的，又怎么陷于孤立，以及为什么这一切“非得”是这样。

我们首先利用了阿尔巴尼亚的文献：恩维尔·霍查的讲话，他的许多书籍以及霍查政权十分活跃的宣传机器的材料。我们还利用了偶尔或间或到过阿尔巴尼亚的我国和外国的记者、经济专家

和研究人员的证词。此外，我们还利用了有关争取自由、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和紧密的友好合作的年月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那个时期的材料、书籍、文献和证词。

我们愿强调指出，这本书并不想回答恩维尔·霍查和他的宣传机器几十年所进行的反对我国的疯狂的、公开的、有时是谩骂性的宣传运动。即使我们打算这么做，通过这么一本篇幅不算大的书，也不可能全都作出回答。我们的意图不在于对阿尔巴尼亚的宣传作出回答，而在于向我们的读者比较客观地介绍恩维尔·霍查的阿尔巴尼亚，因为我们的读者近来越来越经常地感到不理解，地拉那为什么要掀起一场如此公开的、如此敌对的反对我国的宣传运动。

因此，我们的意图不在于压倒地拉那发出的宣传叫嚣，但是我們想公开地，尽量客观地和尽量有根有据地谈一谈，恩维尔·霍查的政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他为什么需要使国家处于“被包围”和“被围困”的境地？没有任何人在包围他，或者驱赶他。显然，他需要这种“围困”和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战争，以便保持自己的独裁统治，实现他建立一个“大阿尔巴尼亚”的想法。

我们在写关于今日阿尔巴尼亚这本书的时候，考虑了要划清，甚至要强调阿尔巴尼亚人民和恩维尔·霍查政权之间的界线，不忘却阿南两国人民的友谊、共同利益以及为反对共同的敌人，争取两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所进行的共同斗争。这一斗争是今后两国人民合作的保证。那些岁月是不能忘却的，尽管恩维尔·霍查暂时已把这一切抛之脑后，甚至不时地对许多牺牲了的南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朋友——鞭尸扬灰。

在过去几十年中，在对待阿尔巴尼亚的态度上，南斯拉夫报界显然受某些“禁区”的束缚，我们要说，这些“禁区”不是什么地方批准的，但是在实践中却是明显地存在的。由于对两国关系终将能

够向前发展抱有一线希望，由于想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持这一线希望（这是南斯拉夫一再表示的愿望），我国报界对阿尔巴尼亚报道得不仅很少，而且回避据认为可能使关系紧张的一切题目。

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阿尔巴尼亚的宣传不仅十分活跃，而且是从敌对立场出发的，是处心积虑的，并一贯如此的。在科索沃的反革命事件发生以后，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结果是，我们对于地拉那的所作所为以及它为对付我们所采取的一切行动，抱着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漠然处之和无所作为的态度。

我国舆论以及全世界都十分清楚，南斯拉夫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再真诚地致力于同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展睦邻关系。今天，没有建立这样的关系，责任在于恩维尔·霍查和他的政权，他们不断地从大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发动反对南斯拉夫的宣传运动，采取反对南斯拉夫的行动。

恩维尔·霍查的政权热衷于建立一个“大阿尔巴尼亚”的迷梦，无视历史和政治现实，甚至竭力想通过明目张胆地干预南斯拉夫的内政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我们既不可能，也不打算通过这本书来对这一切作出回答，填补几十年来所形成的“空缺”。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所希望的，只是使南斯拉夫的读者对于今日阿尔巴尼亚有一个多少是完整的了解。

我国人民十分关心阿尔巴尼亚，这是确凿无疑的。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使这种关心得到了满足，最终的判断总是要由读者来作出的。

作者谨识

1981年7月于贝尔格莱德

第一章

阿尔巴尼亚的“围困综合症”

“欢迎来到世界上唯一真正民主的国家！”

今年4月，当一批英国旅游者忐忑不安地走向边界线时，阿尔巴尼亚官方的“旅游导游”以一种官方的动人语调说了上面这样一句话。

在此之前，向旅客们分发了用英文印刷的《旅游须知》。《旅游须知》上向外宾提供了详细的指导，谈到可以如何进入阿尔巴尼亚，在阿尔巴尼亚境内哪些事可办，可以到哪些地方去玩。

那位“导游”把这一指南重申了一遍，以防有人没有看到。指南上说，旅游者的裤腿不得过宽，以致“呈喇叭形”，也不得“颜色过分鲜艳”。女宾不得身着超短裙或超长裙入境，在阿尔巴尼亚境内期间也不可以穿。如果边防官员认为某位旅游者的服装“有失体统”，或者是为阿尔巴尼亚人所不能接受的，可以要求他在入境之前换装。当然，如果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他将被拒之于阿尔巴尼亚国门之外……

也不允许留长发和蓄胡须的男子入境。

海关人员同样将仔细检查旅客的个人行李，据认为具有政治性、宗教和色情内容的书籍杂志将予没收。

这一套手续使得习惯于欧洲各国开放的边界的许多旅游者心情不安。外国人在履行了这一套手续之后，才得以踏上这个国家的土地，而在这个国家里，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是竖立着斯大林的纪

念碑。

旅游者就这样，带着这些官方的《指南》和《须知》进入这个国家。编年史作者往往称它为“欧洲孤岛”，有些甚至称它为“欧洲幽谷”。

一心制造敌人

是恩维尔·霍查使阿尔巴尼亚度过这些孤独的岁月的，这个国家在他的独裁统治的阴影下已经生活了将近四十个年头。在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历史上，这样一段时期不算短暂。在这段时期里，尽管欧洲经历了一个开放边界和各国人民彼此接近的过程，阿尔巴尼亚却变得越来越不合群，越来越孤立。

今天，几乎可以说，就某些方面而言，它在世界上是“孤家寡人”。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恩维尔·霍查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制造阿尔巴尼亚外界的“敌人”。这成了他固有的想法，至今不能摆脱。似乎全世界都在策划阴谋，反对小小的阿尔巴尼亚，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还是相邻的“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不论是莫斯科的“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还是北京的“匪帮”以及其他许多人，似乎都在这么做。

恩维尔·霍查谈到阿尔巴尼亚的朋友的时候是少有的，少得可怜。他的所有的书——多达三十多部，他的讲话、文章，谈的都是阿尔巴尼亚的“敌人”，都是只想一口把他的国家吞掉的敌人。由此逐步造成了阿尔巴尼亚的“围困综合症”，这在当前成了阿尔巴尼亚的一个特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一“围困综合症”可以说是强加于整个民族的，几年前，它又促使掀起了“把阿尔巴尼亚地堡化”的运动。在阿尔巴尼亚，象雨后春笋似的，到处修建了钢筋水泥地堡。

关于这些钢筋水泥地堡，一位法国记者在 1980 年年底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观感：

“你一踏上阿尔巴尼亚的土地，马上会注意到一个现象。你的目光所及——在公路两旁，在城市和乡村，在山麓和田野以及在高山上——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象倒扣着的盘子似的奇怪的地堡，今天，这已经成了阿尔巴尼亚司空见惯的景色的一部分，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里，这些小工事呈球形，用钢筋水泥构成，四周挖有很深的壕沟，有一个或几个枪眼，通常用树枝和土伪装起来，严禁摄影。这些工事首先是为了对付空降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显然对这些地堡感到自豪，他们断言，唯有原子武器才能摧毁这些地堡……”

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对修建这些“地堡”几乎着了迷。有些外国雇员断言，在内地的一些居民点里，市民修建的房子是带有枪眼的！他们还断言，阿尔巴尼亚用于修建这些“地堡”的钢铁和水泥比用于兴建住房的还要多。

全国生活在被围困和可能发生侵略的恶梦之中。但是，谁能来侵略呢？

这一点连阿尔巴尼亚人自己也说不确切，尽管所有的人都患有这种“围困综合症”。通过报纸，通过墙上和马路上的标语，通过电台，一再提醒居民要“保持警惕”，号召他们必须准备好保卫国家，说必须“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来建设社会主义。

恩维尔·霍查制造了自己国家被封锁的说法，尽管没有任何人封锁它。在斯库台的入口，不是应邀前来的旅客会看到这样一句标语：

“让我们履行自己的全部义务，粉碎封锁！”

在地拉那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标语：

“粉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封锁和包围！”

在恩维尔·霍查的一生中，在他为维护个人的统治而展开的狂热的活动中，制造“敌人”和消灭“敌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恩维尔·霍查不断地攻击和辱骂外界的“敌人”，并不断地消灭国内的“敌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把国内的“敌人”干脆地“扔进垃圾堆”。

恩维尔·霍查及其追随者为什么要虚构阿尔巴尼亚的“敌人”？他们为什么老是用“行将开始的”侵略来吓唬本国人民？当欧洲所有的国家以及全世界都致力于寻求共同语言，使局势缓和下来，尽量取消妨碍各国人民交往的障碍的时候，为什么地拉那却在同所有的国家“开仗”？为什么阿尔巴尼亚是欧洲唯一没有参加欧安会的国家？

要理解这些问题比解释这些问题更困难。恩维尔·霍查在跟全世界吵架。他的敌人是所有的国家，既有社会主义国家，又有资本主义国家；既有富国，又有穷国；既有相邻的南斯拉夫，又有遥远的中国。恩维尔·霍查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都不和。

意识形态死胡同

在所有这一切中间，存在一个规律性，存在一条不间断的主线，恩维尔·霍查的立场和观点就是依照这一规律性，沿着这条主线发生杂技演员般的摇摆的。这就是：霍查始终彻底忠于斯大林。他把斯大林主义，把斯大林主义最恶劣、最根深蒂固的那些成分当做“意识形态死胡同”，他钻进去整整一辈子，现在还呆在里面。

这种忠于斯大林的态度是他的意识形态观点和政治活动的两个经久不变的要素之一。另一个就是他的大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就是他一心想建立一个“大阿尔巴尼亚”，就是要把所有的阿尔巴尼亚人都集合在他的旗号之下。

恩维尔·霍查由于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的，最怕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及他与之结成同盟和保持着友好关系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变化、进行改革和“气候变暖”。作为一位熟练的煽动家，他明白，对他来说，最大的危险恰恰来自民主和开放。

“南斯拉夫事件”之所以必须始终成为他不断攻击的靶子和经常关心的目标，原因就在这里。他的独裁的、封闭的高压政权显然极其害怕富有传染性的“北方的榜样”的影响。霍查之所以双手赞同斯大林把铁托的南斯拉夫“革出教门”，并且随后自己又怀着比别人更大的恶意，更加卑劣地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原因也在这里。

当你浏览一下霍查近三十年来写的书和发表的讲话时，你不得不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霍查确定自己的主要敌人并予以一笔勾销，最主要的是根据他们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态度。

后来，当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队伍中关系发生了变化和实行了民主化，当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纠正了自己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恩维尔·霍查不仅依然固守原来的立场，而且开始同这些党中断关系。那时他的口号曾是——现在看来仍然是——“我的敌人的朋友不可能是我的朋友”。

恩维尔·霍查几乎是不择手段地热衷于制造外界的敌人。他诋毁久经考验的伟人，辱骂昨天的朋友，凌辱意识形态上的同志和战友，污蔑有声望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在他看来，他们全是“匪徒”、“叛徒”、“笨蛋”、“蠢猪”、“疯子”、“法西斯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饶舌者”、“妄自尊大的家伙”、“小丑”等等。

正如一位外国记者所写的那样，“唯有斯大林未被霍查列入无赖的行列”。

事情这样地进行了几十年，但是，势必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在欧洲的边缘，在地中海的心脏地区，霍查成了孤家寡人，但他怎么

又居然能站住脚？他是怎么保住自己的“独立性”的（我们暂且不用“孤立”这个词，尽管这个词用在这里更贴切一些）？

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恩维尔·霍查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的邻国“铁托的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帮了他最大的忙。要是在他的边界上不存在这个不结盟的、同所有的集团保持距离的、独立和爱好和平的南斯拉夫，霍查是很难这样行动的，更难于在这样的孤立状态中生存。让我们懂得：正是这样一个南斯拉夫是阿尔巴尼亚安全的保证。恩维尔·霍查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这反倒便于他同几乎所有的国家吵架，并继续站在刻毒地仇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立场上，几乎达到了偏执狂的程度，这一点也是确凿无疑的。

在事情涉及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时候，要解释清楚，就困难得多。有不少观察家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勇敢豪迈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怎么会认识不清这样的立场是没有前途的？阿尔巴尼亚怎么会超越时间和空间孤立无援达到这样一种程度？

去过阿尔巴尼亚的不多的旅客说，乍一看，阿尔巴尼亚国内局势是稳定的、平静的，但是谁也不否认阿尔巴尼亚存在社会动荡和政治冲突。恩维尔·霍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到今天不时地对自己最亲密的同事以及对普通的公民进行广泛无情的清洗，把他们关进集中营（有时候甚至在区和企业一级进行），明明白白地说明阿尔巴尼亚社会中存在不断的、深刻的内部抵抗。在清洗这件事情上，霍查的效率是很高的，而且是始终不渝的。

要看清楚在官方生活的外壳下面阿尔巴尼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全世界对阿尔巴尼亚所知甚少。

匈牙利的一位记者曾写道：“阿尔巴尼亚是地球上的监狱。它几乎与全世界都隔绝。”

当一位外国旅游者请阿尔巴尼亚导游向他解释解释国内政治